红色记忆

八路军从芝川东渡黄河出师抗日

□ 冯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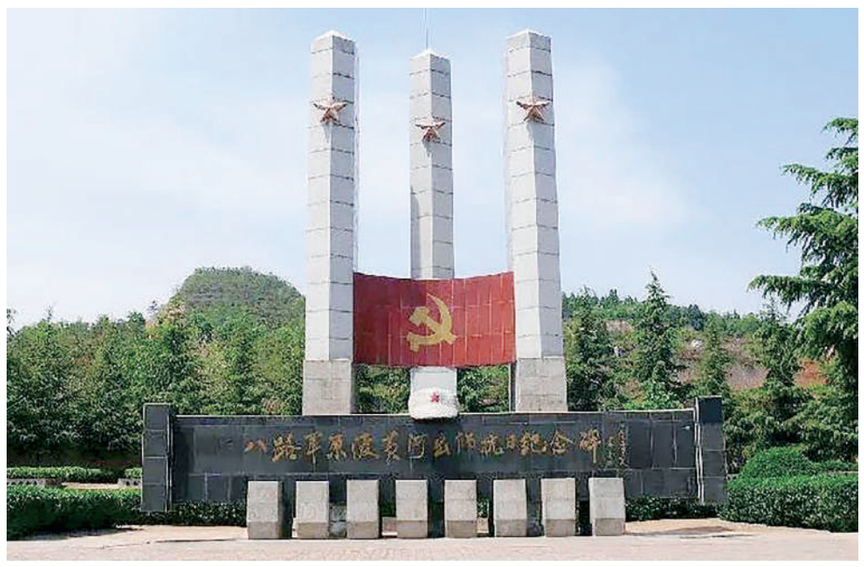
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卷中，八路军东渡抗日这一壮举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不朽的光辉。1937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八路军选择从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征程。这一重大决策的背后，隐藏着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和深刻的历史原因。

红军东渡改编过程充满了激烈的博弈。国共两党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展开了艰难谈判。我党最初要求编4个军，共20个师，编成一路（集团）军。这一规划充分展现了我党对红军力量的合理布局以及对抗战胜利的坚定决心。然而，国民党却心怀叵测，企图通过“溶共”达到“灭共”的目的。他们在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领导权等诸多方面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

在四个不同的地点，历经六次艰难的谈判，双方仅仅取得了三个相去甚远的改编方案。为了民族大义，党中央一次次作出让步，改编人数从最初的规划逐渐让步至6-7万，主力构架编为4个师、16个团，另加2个工兵师。然而，蒋介石却反复无常，不断变卦，使得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在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才基本默认了我方的条件。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兵力为6旅、12团，共计4万多人。

这一漫长而艰难的谈判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为了团结抗战不惜作出巨大牺牲的高风亮节。同时，也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的狭隘与自私。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仍然念念不忘打压共产党，妄图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历史的抉择使得八路军东渡黄河抗日必须从韩城出发。在八路军东渡路线的问题上，国民党曾给出三条路线，但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些路线均不符合八路军当时的自身状况以及全面抗战的形势要求。蒋介石命令红军开绥东出察北，然而这条路线面临着补给困难的问题，并且极易受到日军的夹击。国民党南京军委会提出的路线既浪费时间，又存在着被算计的风险。黄绍竑、白崇禧等人提出的路线同样存在诸多弊端。



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

毛主席在1937年8月17日从延安致电强调，红军为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红军开动必须走韩城”。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1937年，红军虽然在陕北有了落脚点，但处境依旧十分危险，面临着国民党和日寇的双重威胁。南面是对西安事变耿耿于怀的蒋介石部署的重兵，西边是残忍的军阀势力，向北是荒凉的内蒙古高原，而东面的山西正遭受日寇铁蹄的肆意践踏。此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溃败，这为共产党八路军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决定由韩城县芝川黄河渡口东渡黄河出师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八路军各部队陆续从韩城渡过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韩城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扎实的工作基础。早在1927年10月，中共范家庄支部建立，为韩城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八路军的到来，更是如同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韩城人民的革命热情。关中特委、韩城县委一经动员号召，共产党员徐岱云便积极行动起来，动员了二百多条渡船帮助八路军渡河。热血青年纷纷响应，踊跃参加八路军。爱国人士杨一鹤先生慷慨解囊，进行犒军募捐。农民王洪彦更是掏空家底，捐粮捐猪，并送儿子参加八路军。韩城人民积极支前的场景令人动容，正如民谣所唱：“你出钱，我捐粮；韩城儿女支前忙；城砖做工事，门板做船只；还有铮铮亲骨肉，争当八路歼顽敌……”

八路军东渡黄河后，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场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但此战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15师伤亡较大，其中不少是经历过长征的老兵。林彪经过反思后认为，集中八路军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方法行不通，应以敌后偷袭、侵扰为主。这与毛主席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路不谋而合。

1937年8月初，毛主席提出这条作战原则时，引来了诸多将领的不解。在洛川会议上，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应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以打运动战为主。毛主席坚决反对，强调不能轻视日军，硬拼硬打不行，要充分考虑武器装备供应问题。洛川会议结束、部队开拔后，党内仍存在分歧。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很多同志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游击战的战略意义。随着太原失守，国民党军队华北战场全线失利，毛主席发出指示，游击战阶段正式到来。为使共产党及八路军上下彻底理解敌后游击战策略，毛主席在1938年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对游击战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有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论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日军占领山西后，多次进犯陕甘宁边区。1938年3月，日伪军入侵府谷县城，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相互配合，成功收复县城。此后，日军又多次强渡黄河，均被八路军留守兵团击退。日军还曾派飞机轰炸延安十多次。八路军和国民党友军依托黄河天险有效组织了防御，抗日根据地在晋西北、晋西南、晋东北、晋东南等地不断建立，主动出击进攻敌人，牵制了想要入侵陕西的日军。1941年中条山会战失利后，陕西的防御态势恶化，但日军已没有能力渡过黄河，主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东渡黄河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后院起火，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敌后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韩城芝川东渡黄河，开展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由此转入规模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芝川渡口是八路军和中华民族的“生死渡口”，东渡则生，不渡皆死。芝川渡口和黄河天险，是中华民族统一抗战的亲历者、见证者，是人民军队成为领导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建立新中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回顾八路军东渡抗日的历史，我们深感自豪与敬佩。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信念、高超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引领着中国人民走向了抗战胜利的道路。这段历史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文史小百科

漫话瓷板画

□ 卜庆萍

从久远的历史中一步步走过来的瓷板画，严谨细致，难中求精，苛求完美，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中，穿越时空，闪耀着明艳之光，不可不在博深的艺苑中，去探究瓷板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精魂。

瓷板画又称瓷画，既是瓷，又是画，是陶瓷工艺摆脱纯工艺，融入文人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它是在平素瓷板上使用特殊的化工颜料手工绘画、上釉，再经高温烧制而成的一种平面陶瓷工艺品。可装裱，亦可嵌入屏风中，作观赏之用。这种高雅的瓷中瑰宝，最早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到了明代中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板画。从清中期开始，瓷板画的发展走向兴盛。当时的瓷画艺人致力于把纸绢上的中国画移植到瓷器上，瓷板画受到人们的广泛青睐，成为重要的商品瓷。瓷板画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精华，又兼容了中国陶瓷艺术的优点，是绘画艺术和陶瓷艺术的完美结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国绘画史和国际绘画艺术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瓷板画品种繁多，有青花、青花釉里红、五彩、素三彩、斗彩、粉彩、墨彩、浅绛彩等。绘画、纹饰内容涉及面也很广泛，包括人物、山水、花卉、虫鸟、翎毛、鱼藻、吉祥图案等，几乎包罗万象。其形制则有长方、圆形、椭圆、多方、多角、扇面等多种形制。景德镇瓷板画始于明清时期，民间曾把它镶嵌在屏风、柜门、床架等处以用于装饰。

瓷板画与纸绢画相比，材料物理和化学性能都很稳定，不怕潮湿，不怕霉变，其色彩能保持数十年的鲜艳。瓷板画兼具瓷器与绘画的双重价值，制瓷同时也绘画，瓷板画作品艺术价值颇高。

瓷板画从图片的选择、艺术加工，到绘制前乳香油的炼制和颜料的调制、毛笔的处理及绘制的具体步骤和技法，都十分严谨细致。瓷板画还要考虑瓷板、胎釉、上色以及画法技巧，如果做工精良，字体潇洒、流畅，一气呵成，这样的作品乃上乘之作。

瓷板画表现出了中国画的神韵和意味，符合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在构图、线条、色彩、意境上，既吸收了传统国画的画风，又烙上现代山水画的印记。瓷板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当代瓷板画风格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既可满足人们崇尚古典美的需要，又适合人们追求现代时尚的口味。当今社会，现代瓷板画已成为家庭环境布置首选的艺术品之一。

当代瓷板画精品也不是高产，除了绘画之外，还需要两次入火烧制，很容易发生变形、窑裂，成品率比较低，因此瓷板画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纵观瓷板画的发展历史，瓷板画之所以绵延不衰，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艺术魅力密不可分。瓷板画在陶瓷艺术与绘画艺术的融合中，将陶瓷艺术推向了更高的境界，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实乃我国熠熠发光的宝贵文化遗产。

瓷板画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中踏步而来，它一头承载着古色古韵，一头挑起新时代色彩和人文景观，可贵可赞。

史海钩沉

寻觅函谷关

□ 王强

历史上有好几处关城都叫函谷关，但最著名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函谷关。这个地方位于河南省灵宝市北15公里处的函谷关镇王垛村，接近河南、陕西和山西三省交界处，再往西50公里就是陕西，往北过了黄河，则是山西。这个函谷关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雄关要塞，大概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它处在古代两个重要都城洛阳和西安之间的交通要道上。这条道中间的潼关至崤山段，因为多在涧谷之中，深险如函，所以古称“函谷”，取幽深封闭之意。当时这个函谷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为它是秦国通往东方最重要的通道，也是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天下的重要地理因素。当然，这里也发生过一些著名的战役。

纵横之地

战国中期，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实力冠居各国，并且逐步开始对外扩张。这让其他各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很多谋略之士和纵横家奔走各国，向君王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时流行的谋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六国联合一起抗秦，叫合纵；另一种是秦拉拢一些国家，打击另一些国家，瓦解六国联盟，叫连横。这两种谋略的称谓也被认为和“纵与横”的方位有关，秦国位于西部，六国在其东，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合纵与连横”是秦国和各国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

战国时期的主要矛盾，从前期各国之间的互相征讨，变为主要是秦和其他国家的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作为秦国东大门的函谷关的战略地位就非常突出，它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秦国东出讨伐各国，主要从这里出发，各国西进讨伐秦国，也要到达这里。当时要进出秦国，主要有四种方式：

其一，就是走正东面的函谷关。其二，走东南方向的武关。武关在陕西东南到河南西南的南阳方向，春秋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到达南阳一带，南阳有很多楚国贵族墓地，考古也出土过很多楚风的青铜器。这条路主要是去楚国方向。其三，渡陕西和山西交界处的黄河，但当时水运还不太发达，优良的黄河渡口有限。其四，翻越南面的秦岭，这里大山重叠，过了秦岭可以到达巴蜀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和重庆一带。但秦在公元前316年吞并了巴蜀地区，这个方向的威胁也就不存在了。

秦岭和黄河包裹着关中地区，形成了天然屏障。守住黄河渡口，守住函谷关和武关，守住秦岭的关键要塞，就可以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这种地形，只要不犯大错，足以自保，时机成熟，则可以出关逐鹿。这时候，离诸国最近的函谷关通道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伐秦战场。东方诸国曾经多次合纵，联合伐秦，但都在函谷关前无功而返。其中，有两次征伐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

这两场战役在《史记》中也有多处记载，各处记载都有出入，主要是伐秦的参与国不同。没有出入的是，两场战役的发生时间，以及联军都攻到函谷关这个事实。这两次战役，历史记载虽然简单，但背后的内容却并不单薄。攻到函谷关，是当时合纵策略最成功的一刻，但无法进入函谷关，也体现了合纵力量仅此而已。

第一次是苏秦张仪的时代，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是苏秦率军，但这是在他力主六国联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讨伐，是诸国执行苏秦合纵路线的体现。第二次的联盟，是由当时东方诸国中最强大的楚国牵头，由楚国贵族、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主事。此时已到战国末期，各国和秦国的实力差距愈加明显，这是一次各国求生存的抗争，但楚国将领率领的联军依然在函谷关前败给了秦国。也有记载说是六国，但这已经不重要了。这次输给秦军，导致春申君在楚国遭受了楚王的信任危机，不久后他就被门客杀死了。

这两次函谷关之战间隔近八十年，却是一样的结果。后世很多政论和文学作品也经常提到函谷关之战，并以此为鉴，对君主提出劝谏。例如，西汉文学家贾谊《过秦论》说：“六国之士……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

函谷关的旧关楼早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关楼是20世纪90年代根据汉墓中出土的砖上的画像仿建的。虽然是仿建，但还是很有气魄。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还是当年那个地方，地形还在，神韵还在。走到关楼上前后一看地形，就马上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战略要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喇叭口，关前地域开阔，过了关城，马上就收成了一条小道，这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只要坚守关城，关前纵有雄兵百万，也只能徒呼奈何。

函谷关后面那条小道边上立着“函关古道”的碑，道路在两山之间的深沟里，山上都是树木，确实给人空谷幽深的感觉。这条路现在大概有三四米宽，根据历史记载，当年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就是车和马都不能并行，秦军东出到函谷关，一般就走这里。

逐渐式微的函谷关

秦灭亡后，刘邦进入关中，他没走函谷关，而是走南面的武关，武关那条道也不容易进入，但当时全赖项羽吸引了秦军主力，刘邦才得以先进入关中。秦函谷关在秦汉后就逐渐式微了，位置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在后世历史记载中出现也较少。这里可能有几个原因：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东西通道增加了，尤其是黄河水运能力的加强，让函谷关不再是东西通道上的必经之路。而对关中地区而言，函谷关“东西锁阴”的地位被古道西头的潼关所取代。之后，很多稍强大点的北方王朝，如曹魏、前秦、北魏等都能够同时占有关中和中原，这说明崤函一带已经不具有天险优势，函谷关成了内关。

其次，关中地区开发较早，加上战乱，耕地和植被破坏严重，经济逐步衰弱，它的经济中心地位逐步被中原和南方更加富饶的平原地区所取代。经济中心的转移，伴随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关中不再是必争之地。唐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都不以关中为核心区域，也不在关中定都。

再次，中华大地上的主要军事对峙格局逐渐从早期的东西对峙转变为南北对峙。早期的周伐商、秦统一六国以及楚汉之争，都是东西对峙。但之后，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成熟和强大，中国的主要军事对峙逐渐变成了南北对峙。这样，函谷关作为军事隘口的地位就急剧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南北对抗中更为重要的雁门关和山海关等。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对函谷关都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地，因为在秦以后，函谷关的重要性下降了。虽然它很有名，但在时空上，似乎又离我们很远。在离我们更近的历史里，函谷关的重要性和出镜率远不如其他关隘。

前面说了，这个函谷关是秦函谷关，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函谷关。实际上另外还有两个关城用了函谷关这个名：两汉时期，洛阳新安县一带建了个关，也叫函谷关，现在叫汉函谷关；东汉末年，曹操还在这附近建过一个函谷关，叫魏函谷关。魏函谷关已经不存在了，汉函谷关现在还有遗存，是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

从函谷关这个关名的转移就可以看出，秦函谷关在汉以后，作为关键隘口的地位下降，甚至连名字也被挪用了，那段刀光剑影的历史也随之远去了。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